

齐鲁人文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东路梆子带有秦腔的根性，腔调高亢激昂，在发展中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质朴，弱化了秦腔的粗犷，因此，得了个别名叫“山东吼”，也叫“山东沔”。在惠民县辛店镇，一批老艺人几十年来一直在传承和坚守这个地方小戏。

东路梆子：“吼”出的百年传承

□ 李剑桥 胡令强 孙光新

在惠民县辛店镇一位老艺人手里，有一套几十年前镇上创作的东路梆子剧本，手写的，纸发黄，字迹斑驳、模糊，有《穆柯寨探亲》《鱼水欢歌》《金秋风云》《专考她》《套中计》。多年了，不再有人去排练这些剧目，当年参加这些剧目演出的演员也已韶华不再。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多方调查，东路梆子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在明末清初时，山西省同州梆子的流散艺人，随商船沿黄河来山东谋生，到处演唱和传授同州梆子（即梆子腔）。1628年传入惠民县，这种腔调和演唱形式随之在惠民县逐渐兴起、流行和发展起来。后来经过艺人们的加工、创造和受当地方言、民间戏曲的影响，这种同州梆子无论在念白、唱腔、表演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这种变化了的同州梆子和原来的同州梆子，都称梆子腔。可是横笛梆子（即现在的河北梆子）也称梆子腔，这两种梆子还经常同台演出，为了区别这两种梆子，同州梆子被称为东路梆子（因其多流行于济南以东和东北），横笛梆子被称为西路梆子（因其多流行于济南以西和西北）。

东路梆子的兴衰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东路梆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点：先吐字，后拖腔，吐字用真嗓，并且很清楚，拖腔用假嗓，也就是“吼”，听起来高昂、健壮、优美动听，富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东路梆子的表演粗犷、逼真，很讲究运用“绝活”，如纱帽功、甩发功、髯口功、踢鞋功、台步功等。剧种角色各异：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曲牌有数十种，乐队分文场和武场，乐器有大胡琴、月琴、小三弦、二胡、低胡、鼓、锣、梆子等。唱腔板式有大慢板、慢二板、三板、四板、尖板、导板、三七板、哭腔板等。曲调有乱弹、昆腔、柳腔、娃娃腔、滑稽腔、戳腔、磨古噜油子、倒拉车、叫板等。曲牌有数十种，唢呐牌子有：大开门、小开门、水龙吟、点绛唇、大泣颜回、悲泣颜回、起营、唢呐皮、滴溜子、慢中紧、紧中慢、到春来、寄生草、一枝花、粉碟子、五马将令水等。另外，东路梆子的行当齐全，服装严格，坚持宁穿破不穿错的原则。

到清代嘉庆年间，惠民县大湾老艺人张广



惠民县辛店镇前牛村东路梆子剧团演出剧目《辕门斩子》

成、张久成等人，把东路梆子进一步发展起来，盛极一时。整个渤海区，无论是买卖会还是神社会，只要唱戏，都愿唱东路梆子戏。那时，惠民县就成了东路梆子的戏窝了。

为了满足演出需求，很多地方都办起了科班，培养演员。东路梆子日渐受到群众欢迎，其流行区域不断扩大。到清末，山东大部、河北南部以及京津地区，都办起了科班，培养演员，比如惠民办起了“全字科班”“头堡科班”，滨州办起了“顺字科班”，无棣办了“火食科班”，章丘办起了“同字科班”，商河办起了“万字科班”等。这些科班都人才辈出，比如商河“万字科班”的“三万”（即万和、万贞、万庆），惠民“全字科班”的“四全”（即花脸全武、红生全成、青衣全桃、花旦全花），“火食科班”的刘长庚（艺名“银娃娃”），“五虎科班”的韩振铎（艺名咬断弦），这些艺人红遍了东路梆子舞台，也与兄弟剧种交流技艺。比如著名五音戏老艺人鲜桃邓洪山，就曾向东路梆子名旦韩振铎学习表演艺术。

当时以惠民县桑落镇韩龙章村韩振铎为主演的“五虎科班”，聘请了无棣县小泊头的刘长庚、沾化县的卜云秀、乐陵县房家的房凤亭

和王鹤先，以及商河县殷巷的王延贞等东路梆子好手，北到沧县，南至济南，东到胶东，西至德州，到处都请“五虎科班”演戏。当时还时兴几个剧种的合班演出，如东路梆子与西路梆子、京剧等三剧种合班上演叫“三合班”，如果再加上一个剧种就叫“四合班”，但是不管几合班，都得有东路梆子才行。比如，以郭廉孝为首在济南组成的“三合班”演出30多年，曾红遍泰安、济宁、兖州等地。以周康、周买子、贾兴、连拐子为代表的东路梆子戏，就很出名。当时在惠民、章丘、商河、乐陵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情愿砸了面缸，也要看周康；周康演关公，三天不上工。”

但东路梆子经过一段兴盛时期后就逐渐衰落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时局的动荡。特别是日本侵占鲁北之后，国民党溃不成军，四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戏班倒闭，艺人流散，使东路梆子大伤元气。再者，东路梆子的流传缺乏剧本、曲谱等文字资料，仅靠口授，故技艺精髓、表演绝技之流失在所难免。又加京剧、吕剧等兄弟剧种的竞相发展，使东路梆子这一古老艺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接近失传，处于绝迹的边缘。

东路梆子登上“大雅之堂”

新中国成立后，国泰民安，百业复兴。东路梆子老艺人左兴明、左兴亮、刘长庚、孟昭轩、王鹤先等，于1954年合作搭班，组成了惠民县民间东路梆子剧团，在惠民一带演出。1956年，正值全国进行民间剧团的注册登记，惠民县人民政府决定以此民间东路梆子剧团为基础，组建“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同年9月，剧团排演了《白虎帐》，该剧参加了当年的山东省戏曲观摩汇演，刘长庚获演员二等奖。9月15日，受到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的接见。

1957年，剧团招收第一批学员，1959年，剧团招收第二批学员。其中不少学员来自当时的惠民县社会主义大学，使剧团的文化层次得以提升。1960年，剧团再次招收学员。

由于学员在之前戏训班已接受了较长时间的艺术、形体、翻打训练，各方面的基本功比较扎实、规范，所以他们的剧团给东路梆子剧团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强化了剧团武打演员的阵容，并使不少京剧的武打腾翻艺术糅合了东路梆子这一古老的剧种，为日后东路梆子剧团的艺术升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1967年6月，中央“文艺八条”下达，主旨为各级文艺表演团体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保留或解散。据此，县领导决定将东路梆子剧团解体，留21人组成“惠民县宣传队”，排演了《红灯记》，分赴县内各公社进行巡回演出。后宣传队撤销。就这样，原东路梆子的51名演职员，在相距月余的时间里，先后分两批调至县铁厂、拖修厂、土产部、造纸厂等企业。所幸剧团的服装、道具及各种演出设施均被及时封存，毫发未损。此举在当时“破四旧，立四新”之时得以做到，实属不易。这也为日后惠民县剧团现代及古装戏的排练和演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东路梆子剧团在不同时期的演出剧目主要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桃花庵》《麒麟山》《国公图》《反徐州》《破洪州》等，其中《反徐州》经剧团加工整理，主题更鲜明，结构更严谨，文学、故事性更强，群众更加喜爱。另外，还改编了《马二送崇》和《杨三孝打鞭》，并参加了1959年地、省戏剧调演，被省广播电台录音，为东路梆子这一戏曲艺术留下了珍贵的音乐资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七本连台本戏《五女兴唐传》（又名《五凤

岭》）《假婿乘龙》、六本连台本戏《余赛花》、移植现代戏《南方来信》《红灯记》等，尤其是1964年创作演出的《一箭双雕》，参加了当年的地、省地方戏曲现代观摩汇演，颇受好评。而1960年开始移植演出的连台本戏《五女兴唐传》，给东路梆子剧团带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剧中主要演员王存兰、任本昭、王桂英等不凡的表现，在观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时至1965年，可谓是东路梆子剧团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剧团所到之处，无不深得观众褒奖。

据了解，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曾是全国唯一一个从事东路梆子戏曲艺术的专业表演团体，它的建立使这一古老的民间戏曲艺术有机会登上省、地、县各种不同规格的“大雅之堂”，为东路梆子戏曲艺术的继承、发展、普及、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老艺术需要传承发扬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惠民县农村业余东路梆子剧团和演出队，又在惠民大地上遍地开花，如三堡公社前牛家、夹河、阎河、姜左家、淄角公社隋家、三李、姜楼公社庞家、辛店公社西樊家等，都办起了业余剧团或演出队。东路梆子的演员很受人尊重，不论观众还是兄弟剧种的同行们，都称他们为先生。

在辛店镇前牛村，许多上年纪的人是唱着东路梆子成长起来的。农闲时节，他们会经常凑在一起，轮番唱几句，或者说说戏。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的许多人也跟着学起了东路梆子。现在村里能够参加演出的有二十多人，能够随口唱两句的达七八十人。其中，牛洪林最有名，是东路梆子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牛洪林今年75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跟老艺人彭秀林老师学唱东路梆子戏，至今一直未间断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其主要演出的人物有小旦演出《战洪州》中穆桂英和《双锁山》中的刘金定等，深受广大群众的认可。牛洪林始终对东路梆子念念不忘，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着这门古老的艺术。凭记忆，近年来他整理出东路梆子传统剧目《二进宫》《反徐州》《铡美案》《破洪州》《辕门斩子》《双座山》《龙虎斗》《武玉带》等8个剧本，培养带出了两名学唱东路梆子的新秀。

东路梆子带有秦腔的根性，腔调高亢激昂，在发展中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质朴，弱化了秦腔的粗犷，因此，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别名，叫“山东吼”，也有叫“山东沔”的。这是因为东路梆子唱法以本嗓为主，每句的最后一字行腔，用假嗓翻高演唱，发出“沔”字的尾音，富有生活气息，十分动听。

几百年的时间里，东路梆子起起落落。如今痴迷东路梆子的，多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了，但他们大多也只能是或多或少地哼一两句，还能唱大戏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古老戏曲艺术，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传承发扬。

名流影像

从两架风箱、两口铁锅的小作坊，到集纺织、印染、销售于一体，全部机械化生产的大企业。东元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染坊。

东元盛与《大染坊》中的“陈六子”

□ 于建勇

从两架风箱、两口铁锅的小作坊，到集纺织、印染、销售于一体，全部机械化生产的大企业。东元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染坊。

提起《大染坊》，许多人总关心主人公“陈六子”（陈寿亭）的原型到底是谁。青岛人猜测可能是旧时青岛印染业的传奇人物陈介夫；济南不少人认为是东元盛染坊的创立者张启垣；《大染坊》作者陈杰的弟弟认为是其祖父陈立庭；淄博周村区有关部门认为其原型是周村人。这有点儿像近年来的名人故里争夺战。从曹操、诸葛亮到李白、赵云，甚至连孙悟空、西门庆也未能幸免。其实，作为虚构的文学人物，取材的原型可能不止一个，都有一点，但都不是。还是让我们走近真实的东元盛大染坊。

白手起家，从手工操作到机器大生产

在《大染坊》中，有一个情节倒是与一个人很相似。“陈六子”因为讨不到饭，饿晕在染坊老板的家门口，被这家人相救，后来做了这家的上门女婿。在现实中，这个人叫张启垣。张启垣，淄博桓台县城关镇乔家庄人，13岁时独自来到周村。举目无亲的他，在一个大雪之夜，昏倒在石姓人家门口。被救醒后，他就成了石家的小伙计。石姓人家是当地大户，涉足印染等多个行业，后来他作为石家的代表，出任一家染坊的经理，而这也成了他涉足印染业的起点。

后来，这家染坊因股东不和歇业。张启垣便集资将“东源盛”盘下来，更名为“东元盛”。这一年，是1898年，张启垣21岁。

在张启垣的锐意经营下，东元盛逐渐成为周村三大染坊之一。没想到一场战火，打乱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足迹。

1916年，山东反袁护国革命军吴大洲、薄子明率兵攻占了周村。受战乱影响，当时百业停顿，张启垣被迫迁往济南。

之所以选择济南，是因为济南已开埠十余年，特别是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后，这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日趋繁盛。

当时从周村迁来的商号成群结队。没想到一场战乱，竟给济南“送”来了一批客商，给济南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

迁往济南的三年前，1913年11月，张启垣的小儿子张东木出生。张东木后来成为执掌东元盛的重要人物。

初来济南，张启垣一穷二白。当时他从周村带来的，只有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和十几根晾晒丝绸的竿子。此后，他贷款200吊，在棘针市街（后改名制锦市街）开了东元盛染坊。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从欧洲进口的货物减少，尤其是颜料，因为是德国货，价格猛涨。张启垣注意到济南老百姓常穿一种叫“莱芜染”的深蓝布，但济南染坊没有“莱芜染”，这种布用土靛染，不受进口染料价格影响。张启垣决定增染“莱芜染”。

因“莱芜染”技术不好掌握，张启垣专门从莱芜重金聘请了三位师傅，终于染制成功，一炮打响。1917年年底，获利一万吊左右。

当时，在纺织产业中，染布利润微薄，织布利润丰厚。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同时摆脱织布供应的制约，张启垣于1918年开始涉足织布业，走出了向上下游产业链条延伸的第一步。

他们买来棉纱委托农民加工，然后自染销售。短短十年，就在众多染坊中脱颖而出。延长产业链，让东元盛尝到了甜头。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机器染厂陆续登陆青岛等地，手工染坊受到很大冲击。当时手工染的布匹，有一道难以消除的折痕。这是区别于机器染的重要标志。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东元盛有了买机器的念头。1929年，东元盛从天津买来了轧光机等设备；1930年，又从上海买来染槽、卧式烘干机等设备，走出了使用机器的第一步，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岛、潍坊、济南三地，机器染厂如雨春笋般蓬勃发育。在济南，利民染厂、德和永染厂等机器染厂相继筹建。这些新厂的建立，势必带来一场竞争。

东元盛意识到，如不及时添置较齐全的设备，必然在竞争中落后，于是派人从日本买了一台织布机，然后安排工人拆解，再由自家的铁工厂铸造机器部件，一下子就仿造了60多台。

用现在的话，这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在发展机械化的道路上，东元盛再一次走在了前面。

随之而来的一个更大动作是，东元盛扩大生产规模。1933年，东元盛在济南北园边家庄一次购地30亩，将拘囿于制锦市街的生产车间全部搬至新厂。同年，再次从日本采购大量先进设备。

这些设备使东元盛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原来全由人工操作的染布流程，改为全由机器代替，染布速度由一天几十匹提高到一天上千匹。

从手工操作到机器大生产，东元盛的创始人张启垣，完成了从手工业者到资本家的彻底蜕变和华丽转身。等他退出舞台后，留给张东木一代的，已经是一个现代工业企业了。

由盛转衰，大染坊飘然而去

张启垣着眼于染厂的长远发展，有意把小儿子张东木培养成一名印染专业人才。以张东木为代表的第二代，也很称职地扛起了先辈的大旗。

1930年，张东木到北平教会学校汇文中学读书。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已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了，学的是化学专业。

七七事变之后，张东木离开北平，回到济南，本想去大后方的他，被父亲留下照应染厂，从此开始了他的印染生涯。他的人生也因时局的变幻而跌宕起伏。

1937年底，济南沦陷。日军接管了成通、成大和仁丰纱厂，以及各大面粉厂。作为机器染厂的较大企业，东元盛更为日军所觊觎。此后几年间，日本人和为日本人说项的汉奸，多次提议“中日合作”，均被东元盛以商量、拖延等办法挡了回去。

在东元盛高层，总经理明确告诉大家：“让我们干，我们就干。不让我们干，我们就停产！如果日军强迫合作，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要准备出去自谋职业。”

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宁折不弯，浩然正气，的确令人佩服。因为拒绝“中日合作”，张东木的大哥、东元盛经理张伯宣被日军以“通匪”为由逮捕；二哥、副经理张让青被以拉拢行贿为由逮捕，日军又以东元盛私存军用物资汽油（实为染厂烧毛用）为

由，声言逮捕厂长张东木，张东木躲到同学吴鸣岗家才得以幸免。后经伪济南商会会长苗兰亭出面解释，日军才取消了逮捕令。

东元盛也因此成为日军找茬的对象。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规定凡未与日人合作的企业，必须出售库存物资，且只能按“官价”，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东元盛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约4万匹全部折价卖出，损失极为惨重。

当年11月28日，张启垣老人被日军活活气死，享年65岁。

由于没与日军合作，济南沦陷八年间，东元盛始终坚持独立经营，这在日军铁蹄下确非易事。

作为一名爱国企业家，新中国成立后，张东木又做出一件壮举。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捐献了一架飞机（旧人民币15亿元），成为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

在张东木的带动下，成通纱厂经理苗海南也捐献了一架。消息传到青岛，清末山东巡抚周馥嫡孙、华新纱厂掌门人周志俊也捐了一架。全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就他们三人，济南占两



张东木晚年照